

施耐庵
之
謎
新
解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施耐庵之謎新解

王同书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施耐庵之谜”新解

王同书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施耐庵之谜新解

王同书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南京七二一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4插页 31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

ISBN 7-5059-0158-3 / I·107

定 价：6.90元

序一

走 自 己 的 路

——《施耐庵之谜新解》序

冯其庸

前几年，我曾到江苏大丰、兴化去调查过有关施耐庵的文物和遗迹，前后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带着研究生去的，凡大丰、兴化有关施耐庵的地方我都去了，还坐了船穿行于水乡港叉之间，这种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道，确有点水泊梁山的味道。

我在大丰，看到了《施氏家簿谱》原抄本，还看到了“施让地照”、“施奉桥地券”、“施廷佐墓志铭”、“施□桥地券”、“木主牌”、“□子安残碑”，以及位于兴化施家桥的施耐庵墓等等，总之，两次的调查，我的收获是很大的，印象十分深刻。

以上这些文物，除了四块砖刻大家没有真伪问题的争论外，其他一些实物，都还有些争论，特别是对施氏家谱，意见颇有分歧，关键是施彦端是否就是施耐庵，颇令人怀疑，因为“字耐庵”三个字是旁加的。

意见有分歧是难免的，而且是正常的。

对于有关施耐庵的争论，我是很关心的，也颇想花点力气来做一些调查和考证的工作，但近年来实在事忙，分不出身来，因为施耐庵的争论，不是一个小问题，牵涉面很广，所以终于至今我还没有参预这场争论。

但是，不参加争论不等于自己没有想法。几十年来，我读书治学，自己遵守的一个原则是：一、重视文献资料。凡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文献资料，都要认真研读，细心探究。我这里所说的文献资料，不仅仅是指历史资料、档案、文书等等，而且包括研究对象的诗文集，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文字资料。我认为做研究工作，第一要做的当然是精研有关的文字资料，这是研究工作的根本和基础。二、重视地下发掘。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辉煌业绩，从原始文化的发掘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有重大的发现，这无异是打开了一座座埋藏着的地下博物馆。我认为这许多丰富的地下资料，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可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知所未知。我认为今天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幸福的时代。这许多地下宝藏，不仅仅是补文献之不足，而且是大大丰富和大大开发了文化历史资料。古人常说读“天书”，如《水浒》里就有“还道村受三卷天书”等等的情节。事实上“天书”是不存在的，然而却确实存在着千百万部“地书”——地下发掘出来的无数宝藏。在今天，我认为不读这部“地书”，你的文化历史知识就会显得落后，就会跟不上时代。然而，现在有不少人只知道不学东西方外国的文化是落后，是跟不上时代，而不知道不读我们的“地书”也是大大

的落后，大大的跟不上时代。就连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如不读我们的“地书”，他也照样落后，照样大大落后于时代。所以在今天治中国的学问而不知有“地书”，不知去努力读这部“地书”，乃是实实在在的落后，实实在在的跟不上时代。所以我主张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更要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其优秀的成分，以作为发展我们新文化的基础。三、重视地面调查。我们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我们中国又是一个文化历史十分悠久的大国，我们全国各地的文化遗迹简直数也数不清，由于我们经济落后，开发得晚，全国绝大部分地方，还保留着原始的或历史的地貌。当你读古史或古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十分遥远、十分渺茫的时代，但是当你走出书斋，进行实地的文化历史的考察时，你就会意外地发现那些遥远时代的历史物证，仍然还保存在地面上，面对着这些历史遗存，你会感到遥远的历史就在你的眼前，一下就缩短了距离，增加了感性的知识和感受。我调查过很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我在陕西王曲地区，还发现过一个规模极大的原始社会遗址，其遗存之丰富实为罕见。我也参观过郑州的商城、新郑附近的郑韩故城，以及位于郑州东面荥阳地区的鸿沟，即楚汉相争划界的地方，在洛阳看过汉魏时期的洛阳城，在盱眙看过项羽起兵时的东阳城，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除了参观大地湾遗址外，还参观了附近的龙城，据说，这是飞将军李广的故里，汉时故城至今依然存在。在新疆除交河、高昌故城外，还到过轮台、焉耆和库车，库车，即古龟兹国。这些地方的历史遗迹都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实在遍及全国，无需一一列

举。我国地面遗存的历史遗迹之丰富，实非局外人所能梦想。所以我说地下发掘加地面遗存，我们拥有的地面和地下大书，实在是浩如烟海，所以这地面遗存的历史陈迹，也是必须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是一部必读之“书”。四、要重视民间传说。民间传说，与地下发掘和地面遗存不大一样，它的流动性和变异性比较大，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包含有重要的因素，往往把它的流动性和变异性排除以后，它却包含着历史真实的成分。譬如，我到天水龙城，就听到关于女娲的传说，当地还有娲王庙，老百姓说女娲是他们村的人。而就在邻近就是大地湾原始社会的遗址，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在这个遗址里的地面上，发现了我国最早的一幅地画，画的内容是母系社会的生活。那末，这女娲的传说，是否与这个母系社会的遗址有若干联系呢？身临其境以后，很自然地会使人产生联想。

我们有许多处重要的地下发掘，起先都是受到民间传说的启示，例如南京南唐二主陵的发掘就是如此。所以人民的口头传说，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也不容忽视。

我多次讲过，我国的历史研究，或者再扩大一点说，我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进入了黄金时代，其中尤其是文史方面的研究。我认为过去的学者如王国维所不能梦想的时代，在我们却成了现实，郭沫若虽沾上了一点边，但还是去世得太早了。近些年来重大的地下发掘，确实震惊了世界，同时也大大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打开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看到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光辉远景，而且更使我们懂得我们应该如何下手。

我讲上面这些话，似乎与施耐庵及《水浒》的研究离得很远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觉得在大丰、兴化地区，关于施耐庵的资料，以上四个方面都涉及到了，当然其规模是不大一样的，但其根本的道理却没有什麼不同。我认为已发掘出来的墓志铭、家谱以及大量的民间传说等等，确实应该引起重视，应该作认真的研究，当然，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同志作了较为认真的探索。

其中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家谱与施耐庵究竟是否有关的问题。有人认为在“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元配季氏、申氏、生让”一行内，在“彦端公”三字的右下侧旁加“字耐庵”三个字，这旁加的三个字是不可靠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在旁加。我个人认为这旁加的三个字，与原来抄写正文的是一个人的笔迹，只要仔细辨认就可以看出，尤其明显的是那个“字耐庵”的“字”字，与相邻的四个“字”字笔势完全一样，“耐庵”两字虽未找到同样的字，但仔细分析其笔势，与正文抄写者的笔迹也完全一样。这说明这三个字，虽系旁添，实际上是一个人写下来的，很显然是抄漏后补添上去的。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试想我们现在抄写东西，能保证一字不漏吗？如果我们抄漏了又自己补抄在旁边，别人却说这不能算数，因为是旁添，这我们能同意吗？因此，这施谱上抄漏后原笔旁添的三个字，我认为应与正文一样看待，不能因为旁添而不承认它的重大的史料价值。

其次是辨别真伪，要看实质，不是简单地看它是否是原抄正文还是后来的旁添侧出。原抄正文未必无一点差错，旁添侧出也未必一定就不可靠，应该考虑到在封建社会里，宗

谱是不能拿来与一般的书一样进行买卖的，因此如无根据，他们也就不会凭空添上，即使凭空添上了，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何况在封建社会里，施施耐庵是个危险人物，思想带有叛逆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他们的老祖宗，又何必旁添上这个具有强烈的危险性的人物呢？

前些年，我研究过《五庆堂曹氏宗谱》，写了《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在研究过程中，首先就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研究的结果，却发现谱文正文开始的曹氏始祖曹良臣以及二世祖曹泰、曹义都是与曹雪芹的上世毫无关系的历史人物，但是他们却堂堂皇皇地被谱入曹氏家族，当然是正文书写，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不少旁添旁改和另一种笔迹增添的文字。例如在“十四世天佑”下，就有一行小字“颦子官州同”，笔迹与原抄不同，但是曹天佑是曹颦的儿子，至今并没有被否定。所以，我们决不能认为凡被写入正文的就可靠，凡旁加旁改的文字就不可靠，要如果真是这样的研究方法，那末这种研究，岂不也太容易了吗？因此，我认为对《施氏家谱》不能轻率地采取否定的态度，我们应该深入地认真地研究它。

本书的著者王同书同志，对施氏家谱和施让、施廷佐等人的出土文物以及《水浒传》，作了勤奋的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前者，即对家谱和文物的研究，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可以说，他是目前研究施氏家谱最勤奋的一个，他不顾有不少人对这部家谱持否定的态度，勇往直前地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在学术道路上的这种独立不移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同书同志的文章，我大部分是读过的，我觉得在地处海滨的大丰，在搜集资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能做出这么显著的成绩来，确是不易的，他的一部分论辩文章，也是写得很有说服力的，我对于他的这种论辩的精神，也是十分赞赏的。

做学问，一方面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要脚踏实地，刻苦钻研，潜心思索，决不能自以为是，因此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因为天地间的学问太大了，穷我们毕生的精力，也不可能包罗一切，穷尽一切和精鉴一切。我们的学问，拿整个宇宙间蕴藏的学问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昆仑一石，没有任何可以值得自大和骄傲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敢于争论，敢于直言。敢于争论、敢于直言和谦虚谨慎，闻过则改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一个做学问的人必须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品德。

再有，谱牒学原是史学的一科，但是建国以来，却很少人问津，非但很少人问津，而且把它看作是一种不轨之学，如有人要研究宗谱，则似乎可能有点想复辟封建主义的味道，记得十多年前我在研究《五庆堂曹氏宗谱》时，就有朋友怀着好意来劝告我，别再找麻烦了。言念及此，岂不可叹！殊不知谱牒学确是史学的重要一科，古往今来的谱牒中包容了多少珍贵史料，目前，在国外已经有谱牒学会之组织，这真是“礼失而求之野”了，中国的谱牒，却让国外的学者组成学会来进行研究，我们则仍在瞻前顾后，迟迟不进，这种情况，实在也是落后于形势太多了。

面对以上情况，王同书同志竟然拿出自己多年研究施氏家谱的论文专集来，不畏艰难，不趋时尚，做老老实实的工作，虽然所研究的成果或许有得有失，但这种勤奋为学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确是可贵的。

同书同志书来催我作序，我只好随感式的写上一些，虽是随感，却是真话，是实感！

1986年12月11日

于京华宽堂。

序二

王同书同志《施耐庵 之谜新解》序

朱一玄

王同书同志《施耐庵之谜新解》一书，是他对施耐庵研究的可喜收获，是对古典小说研究的重要贡献。

在这本新著将要出版的时候，我想谈两点对施耐庵研究的看法。一是回顾一下施耐庵之谜的形成与现状，二是谈一谈对当前施耐庵研究的意见。

先说第一点。1982年4月，我应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之邀，与张志岳教授等十几位专家一道，去江苏兴化、大丰两县参观、考察有关施耐庵的文物史料，并举行多次座谈，共同发表了《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同年9月，为了参加南开大学中文系科学讨论会，我写了《关于施耐庵生平的几次考察》一文，目的便是回顾自明代以来施耐庵研究的情况。那篇文章谈到，施耐庵的生平，最早的记载见于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辨证类·三国宋江演义》）和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两书都说《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也就是说作《水浒传》的施耐庵

是钱塘人。以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又说“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这又进一步说明施耐庵是元朝人，“武林”和“钱塘”都是现在杭州市的古称。崇祯末年，金人瑞腰斩和评刻《水浒传》时，又伪为《水浒传序》，称“东都施耐庵序”，既不知所据何书，也不知“东都”究竟是指什么地方。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中把《水浒传》分作简本和繁本两种，认为“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又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这是说鲁迅怀疑事实上施耐庵这个人。

但有关施耐庵的记载仍时有发现，现将比较重要的五次考察简述如下：

一、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

民国十七年（1928）十一月八日上海《新闻报》“快活林”栏发表了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记载了他所得到的施耐庵生平材料。其中引述淮安袁吉人《耐庵小史》和淮安王道生《耐庵墓志》，最为人所注意，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施耐庵传记。胡瑞亭文的要点为：

（一）名子安，字耐庵。

（二）元末明初人，活了七十五岁。

（三）家淮安，卒后由其后人述元迁葬兴化大营。

（四）元末赐进士出身，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郁郁不得志，愤恨以终。

(五) 曾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士诚征聘不至。

(六) 罗贯中是他的学生。

(七) 著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

二、李恭简等《兴化县续志》所载施耐庵传记

民国三十三年（1944），李恭简等修《兴化县续志》，也收了上面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中的《耐庵小史》（卷十三《人物志》补遗）和《施耐庵墓志》（卷十四《古文》三补遗）两篇传记材料，但都增加了内容：

（一）名字，除了名子安之外，又增加了原名耳。

（二）生活时代，除了元末明初人，活了七十五岁以外，又增加了生卒年代，即生于元元贞丙申岁（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卒于明洪武庚戌岁（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

（三）籍贯，除了家淮安，卒后由后人述元迁葬大营的说法外，又增加了白驹人，祖籍姑苏一说。

（四）中进士的时间，又由元末赐进士出身，具体化为至顺辛未（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进士。

三、刘冬、黄清江《施耐庵与水浒传》和丁正华、苏从麟《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

1952年第二十一号《文艺报》同时发表了刘冬、黄清江《施耐庵与水浒传》和丁正华、苏从麟《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两文。

刘、黄文提供的材料，除前述《兴化县续志》所载《耐庵小史》和《施耐庵墓志》外，还有白驹镇施家舍所供神主和1942年蔡公杰所立的墓碑。

丁、苏文提供的材料，除前述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兴化县续志》所载《耐庵小史》和《施耐庵墓志》外，还有：

（一）《兴化县续志》卷一补遗关于施耐庵的记载。

（二）《吴王张士诚载纪》卷四附考引袁吉人编《耐庵小史》。

（三）《施氏家谱》。

（四）施耐庵墓碑说明。

（五）施耐庵第十八世孙施熙所作的祭文。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施氏家谱》。谱是清咸丰四年所修，抄本。内有：《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施氏族谱序》、《施氏宗祠建立纪述》等文及施耐庵以下十二世世系。

这部分咸丰《施氏家谱》中的施耐庵材料，和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李恭简等《兴化县续志》所载者又有不同：

（一）名字，只说彦端，不再提子安或原名耳。

（二）籍贯，《处士施公（让）墓志铭》说“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施氏族谱序》、《建祠纪述》又都说施耐庵明初自苏迁兴化，后徙白驹场，皆不提家淮安，卒于淮安，到其孙述元才移葬兴化大营的事。

（三）世系、神主和族谱都列施耐庵为始祖，和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列为十五世祖者不同。

四、赵振宜等《清理施让残墓文物及继续调查施耐庵史料报告》

1962年6月，中共兴化县委宣传部派赵振宜等同志去施耐庵墓所在地施家桥采访，发现施让（传为耐庵子）墓之“地照”方砖一块，所记年月“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恰好和杨新所撰《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所记年月完全一样，可以证明施让墓是可信的。

这时，赵振宜等同志还对有关材料如《施氏宗谱》、《卞氏宗谱》和《兴化县续志》作了考察，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施耐庵墓志》和传略，无论是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所引，还是《兴化县续志》所载，都是经过改动的，原文究竟如何，尚难确知。

五、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施耐庵文物史料参观考察座谈会

1979年8月在江苏省兴化县新垛公社施家桥发现《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1981年10月29日大丰县大道公社和瑞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施俊杰献出《施氏长门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于1982年4月18日至25日，邀请国内部分《水浒传》研究工作者张志岳等，对上述新发现的有关施耐庵的文物史料，进行了实地参观和认真考察，并由刘冬同志主持举行了多次座谈，写出了考察报告。大家认为：这块新发现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对进一步研究《水浒传》及其作者施耐庵具有重要价值。墓志铭表明元末明初在现在江苏省兴化县施家桥和大丰县白驹镇一带，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彦端。这位施彦端，与新发现的民国十七年过录载有乾隆四十二年序的《施氏长门谱》所记，施以谦之父“彦端公字耐庵”的“彦端”相符。因此结合以往发现的文献资料 and 大量的民间传说，元末明初在江苏兴化白驹一带，有